

试论作为精神生产的思想政治教育

黄祎霖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于人类社会生产分工中产生,以阶级意识播化、文化心理建构、价值信仰内化存在于国家、社会、个人的精神需要体系,是精神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是一定思想政治观念的个性化生产,其过程围绕意识形态的转化展开,其成果指向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并由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交往互动实际推动。依据这一精神生产之特殊,思想政治教育亦可被理解为“转化式”“个性化”“互动式”的生产,在转化式生产中注重创新、在个性化生产中把握需求、在互动式生产中加强引领,是推进作为精神生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思想政治观念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4)1-0031-08

思想政治教育是自阶级产生以来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实践活动,它意将一定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所倡导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故而通过各式各样的教育活动引导人们形成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发展相应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政治教育虽活动于现实物质生活世界,却实质作用于社会精神生活领域,通过精神交往改造人的精神世界,进而完成特定精神形式的社会传播与认同构建。从社会生产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生产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分属精神生产部门。更进一步看,若对精神生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作深刻理论考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精神生产,是精神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判断,诸多研究都作出过近似观点的表达。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为何是一种精神生产,这一精神生产又有何特殊,当如何推进?学界尚乏细致分析。从学理上阐发这些问题,对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进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一、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何以成立

精神生产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精神需要而进行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活动,人类社会最初的精神生产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密切。思想政治教育萌发于人类原始的仪式、秩序、习俗、禁忌等教育活动,随着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严格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才真正产生^[1],这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分工有直接联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分工的角度考察了精神生产的起源,在他们看来,历史上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是随着真正的分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2]534}出现的,“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2]551},将本阶级的利益虚构成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并“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2]537}。思想的生产与分配、阶级利益的精神化与社会化,涵盖了这一原初形式的精神生产的主要内容。那些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不仅做着阶级利益的精神化工作,还进一步做着精神化阶级利益的社会化工作,其具体过程,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

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552}，从而将“阶级的精神”推及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精神”。这种与精神生产过程统一起来的，或者说其本身就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的“精神的社会化推广”，就包含着我们所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甚至可以认为，从物质生产独立出来的精神生产，其最初的表现形式就与思想政治教育高度吻合，而其他的精神生产形式，是随着精神生产系统的专门化与精细化，才不断演化发展出来。

于人类社会生产分工中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发展成熟并作为一项独立的实践活动为人类社会所广泛运用的历史进程中，从某些特定的方面满足了人类社会的精神需要。这些需要，作为“生产的前提”与“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3]15}，进一步将思想政治教育确证为一定形式的精神生产。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活动，也指涉人的信念与信仰。作为精神存在类型的意识，在这里仅作狭义的理解（广义上的意识与物质相对，也即精神），是关于人对事物或现象的某些认识、识见或觉察等；心理活动则是与之相对的有感觉、想象、情感等活动，二者构成人的精神一般。在一定的意识基础与心理状态下人所形成的稳固的、确切不疑的并引以为自身行动指南的认知体系，就是信念信仰。需要是人的具体活动的条件和前提，是展现人的本性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可以基于人的不同存在形式进行理解。如人的阶级性存在，反映了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人的社会性或群体性存在，反映了人在一定共同体内的身份角色及其生活状态；人的价值性存在，反映了人对自我与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依据不同的精神类型与人的存在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类社会的精神需求满足，可从以下方面探讨：在意识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对人进行一定的知识、观念等教育，使其形成符合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期待的国家的、政治的、阶级的意识，表现为满足国家或阶级对于阶级意识播化的需要；在心理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对人进行思想引导与心理调适，使其适应和融入具有特定生存规则与文化语境的社会文化共同体，表现为满足社会关于文化心理建构的需要；在信仰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对人进行价值的引领与塑造，使其为

自身价值的实现而形成某种生活与行动的信念，并构建起内心的信仰，表现为满足个体关于价值信仰内化的需要。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满足国家关于阶级意识播化的需要。一定的阶级总是具有代表这个阶级的精神标识，马克思称之为“本等级的特殊精神”^{[4]159}，其核心内容是阶级意识。阶级意识是阶级地位和利益在思想意识上的反映。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总是存在着阶级间的冲突与对立，而只要阶级冲突存在，从属于不同阶级的“特殊精神”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阶级意识的传播与教化。《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5]66}。列宁在领导俄国工人革命过程中，同样意识到传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向工人进行灌输教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意识形态建构使得社会中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根深蒂固。在列宁看来，工人运动决不应重蹈工联主义的覆辙^{[6]209}，要“坚决地告诉工人提防那些叫嚷不要‘夸大自觉因素’等等的蹩脚的谋士”^{[7]328}，“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7]342}。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严厉地批驳了那些关于“‘收起’共产主义”、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言论，强调：“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8]687}这里的“共产主义”就是无产阶级进行自我规定的“特殊精神”，而对它的保留与坚持，则要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教育为前提。可以确定的是，任何形式的国家都存在着不同阶级的“特殊精神”，不管是国家的统治者，还是试图推翻政权的革命者，都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并强化本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而构建本阶级“特殊精神”在社会意识领域的主导性，前者以其夯实政权存续的思想基础，后者则以其凝聚夺取政权的精神力量。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满足社会关于文化心理建构的需要。所谓文化心理，就是生活在某一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状态。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固然是因其具有协调秩序、组

织动员、增进共识等实际功能,但从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因考察,这些需要都可以归结为对创生、聚合、传播社会文化理念的深层次精神价值需求。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都是一个文化心理共同体,而每一社会的共同文化心理又总是蕴含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结晶,它一定程度外化为社会成员的精神风貌。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与“思想的政治”或“政治的思想”相关的特殊政治实践活动。但无法忽略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关于教育的活动,核心是关于“社会化”的教育,它具有选择、传递、创造和延续文化心理的特定功能,使社会成员自觉地融入这一文化所形塑的社会生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就不仅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工具,更是社会文化心理的一种调适机制,是社会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方式。它以理念创生激活特定文化的生命力,构建相应的文化心理认同,使得这一文化共同体“不仅会容纳而且会积极鼓励所有的、任何能够对人们共同需要的意识的进步作出贡献的人”^{[9][12]},进而对这一社会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作合理性阐释。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个人关于价值信仰内化的需要。个人价值的实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意蕴。就历史上的中国人而言,其普遍的价值追求,在古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近代是“救亡图存”,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则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不为个人直接生产价值,却通过理论灌输与思想教育,推动个人形成其所属时代和社会的特定价值观念,从而引导其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追寻和实现价值。所以,关于价值实现的需要构成个人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诠释。同时,个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还有另一重意义,即关于信仰的需要。“对于个体而言,拥有信仰,就相当于拥有精神上的支柱。”^[10]中国古代的封建儒教与西方基督教曾分别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东西方人民的普遍信仰追求,虽究其实质,它们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压抑人性、统一思想而实施的教化活动的产物,但却也在特定历史阶段为人的生存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栖所。马克思主义信仰从根本上区别于那些愚弄人、奴役人、剥削人的虚幻的信

仰,是关于真理的信仰。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传播、构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从来都是这一教育实践活动的核心议题,而用科学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掌握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当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

总之,正是因为客观存在的这些关于阶级意识播化、文化心理建构、价值信仰内化的需要,必须经由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得到实现和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即可被视为一种生产,一种满足这些特定精神需要的精神生产。

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为何特殊

通过历史的考察与“需要——生产”逻辑的确证,我们将思想政治教育指认为精神生产。那么,作为精神生产的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如何特殊地进行精神生产活动?这就要进一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特性在其精神生产结构中的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政治性与教育性的双重属性,它一方面要服务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构建,另一方面要致力于人的思想素质的提高,前者以后者为前提和实现方式,后者则以前者为依据和实践旨归,二者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具体活动。这一过程表现为:教育者将主导意识形态转化为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交往内容,在互动中引导教育对象实现对这一意识形态的接受与认同,在认同机制作用下形成发展自己的新思想、新认识与新观念。从精神生产的视角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最终产出是新的思想、认识和观念,它们蕴含共同的意识形态内核,其表现形式独特多样,彰显着主体精神的鲜明个性。基于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精神生产,可被归结为一定思想政治观念的个性化生产,其具体内涵,则可从3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精神生产是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生产,其过程围绕意识形态的转化而展开。与“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等精神生产形式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精神生产,并非某种具有现实形式和物质外壳的精神成果的生产。它与“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

言中的精神生产”^{[12]524}也略有区别,不是关于高级的意识形态的专门化生产,而是一种潜藏于教育活动并随其过程展开而共时进行着的思想观念的生产,且其生产的不是什么其他一般的思想观念,而是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所谓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是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思想观念,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是其基本特性。它既包含人的一般政治思想,主要是对政治生活思考中所形成的观点、想法和见解,也包含人的一般政治观念,主要是对国家、阶级、政党以及各种社会势力在社会中的制度政策、活动、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还涉及在这些政治思想与观念体系影响下的对于善和恶、荣和辱、正义和非正义等道德问题的判断与意识。

一定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虽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在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决定,但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统治基础,使统治的合法性资源得到及时有效扩充,就必须在社会精神领域开展广泛的“凝聚思想共识”的运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意识形态体系进行解释说明,为其“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11]125},将其主导性的确立建立在人心认同的基础之上。而“社会普遍承认”与“人心认同”,就具体体现为社会成员形成符合一定要求的思想政治观念,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以观念的反映。与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并不保有“独立性的外观”^{[12]525},人的观念要对特定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映,首先就要求这一意识形态以“可感知”“可认识”“可反思”的形式出现在人的精神交往中,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精神生产的过程,就必须围绕意识形态的转化展开。这一过程明见于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例如,在教育准备环节,教育者要在理解、吸收、内化相关思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个人的施教内容;在教育实施环节,教育者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将教育内容中的那些无形的思想价值转化为对象所易接受的形式,这都反映了作为精神生产主体的教育者对进入意识与思维中的意识形态内容进行改造加工的过程。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生产行为,就是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创生过程,具有“引领”“引导”与“催生”的意味。而关于“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的生产”,并不以“从无到有”的新质精神生产为其目

的,而是以传导一定意识形态为其“实践动机”,并将这一意识形态反映到人的思想与观念之中的转化式生产。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精神生产是思想政治观念的个性化生产,其成果指向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作为精神生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生产,更是这种思想观念的个性化生产。思想政治教育虽是围绕特定意识形态传导而展开的教育活动,但决非是被规定的、机械的精神灌输与传递,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具有灵活性与多变性,它的具体运行方式受制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实际思想状况,也因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氛围、实际教育语境等外部条件的差异而发生变化。“个性化”生产的首要意义是这种思想政治观念总是内生于现实的人。思想政治教育面向的都是充满个性的独立个体,是处在不同社会背景,有着不同社会地位、知识水平、文化涵养与发展期许的特殊个人,他们不会消极被动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而是作为能动体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接受这一活动施加的影响,从而构建生成与之关联又相对独立的思想政治观念。“个性化”生产的意义也在于发起和组织这一思想政治观念生产活动的主体是个性化的教育者。预期的教育目标已然包含着教育者对教育对象思想政治观念塑成后的“想象”,它驱使着教育者规划和组织起符合这一“想象”的生产模式,并在其过程展开中展现自己经验、魅力以及独特的思维方式,为当下这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烙上自己的独特印记。“个性化”生产的意义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在具体教育环境中进行着精神的具体生产。“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12]333},思想政治教育也以环境作为其重要的信息生产要素,在适应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精神生产总是要不断地同化外部信息于自身的生产结构,同时又被不断地改变着生产结构自身以顺应外界环境、顺应处在这一环境中的并受其持续影响着的主体。

思想政治教育关于人的思想政治观念的个性化生产,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与人的思维活动的相对独立性所共同决定的,这一缘由也同时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精神生产的成果,始

终指向人的培育与发展,具体来看,是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素质是对人的发展能力的反映,思想政治素质是人的素质系统最重要的、占主导地位的素质,而思想政治观念则是这一素质在观念层面的核心体现。不管什么人,只要栖身于政治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就会有自己的思想政治观念,而这一观念能否正确反映生存现实、能否真实契合主流价值,就决定其能否使自身形成发展所需的思想政治素质,从而影响其在当下社会的自我意义实现。毛泽东提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2]226},正是这个道理。在政治社会中,为了让成员以社会所期待的方式实现个人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这种个性化的精神生产就会被充分调动起来,用之以净化和升华个体的“灵魂”,使个体的思想政治观念得到改观提升,为其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这种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的个性化生产,由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交往互动而实际推动着。“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12]524},“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12]520},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的个性化生产,实际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往中发生着,也就是在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互动中具体发生着。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关系,不是生产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既然生产的结果是个性化的思想政治观念,那么生产的客体或对象,只能是被改造的思想与观念。教育双方在互动中形成主体间的关系,作为共同的主体推动生产的进行。其中,教育者为主体的生产过程是教育者将特定意识形态纳入其意识范围并加工改造为其传授内容的过程;教育对象为主体的生产过程是教育对象对自己原有认知体系进行重塑并生成新的思想观念的过程。二者不是分离的两个阶段,而是相互联系着的统一过程。教育对象思想观念的现实状况影响着教育者要将哪些思想纳入其精神加工范畴以及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加工转化这些思想;教育者传导给教育对象的那些已被改造的思想内容,也影响着教育对象对主导意识形态的认识层次与认同程度。当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教育者虽不直接参与对象的思想观念改造(被改造的观念为教育对象所独有且仅存在于教育对象意识范

畴,教育者无法直接对之以思维),但经其转化的思想内容会由教育对象接收并成为其思维的对象与手段,帮助教育对象改造或重塑自己的思想观念。

此外,教育双方在交往中实时发生的有关需求的表达、判断的干预、选择的干涉等行为,也都影响着二者精神活动的实际状况。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精神生产的顺利开展,就要求主体不仅要具备认识和把握生产对象的能力,还要具备主体间彼此沟通的能力,在双向交流中进行有意义的信息交换。信息交换使主体掌握着变化中的思想观念,对生产对象以动态的把握。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主体间双向交流的过程,是他们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的过程,是“主体之间相互开放,是两个人心灵的实实在在相遇,在相遇中发生碰撞也发生融合,在碰撞中融合”^{[13]78}。这种双向的认识与理解,也让教育双方在现实的生产互动中发生着变动与转换,此时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都只是作为现实的人,改造和生产着、相互改造和相互生产着在场的人的思想与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精神生产是基于主体间的交往的生产,而这种交往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认识、相互理解来实现,它经由人的自我意识构建,凝聚生成个体的思想政治观念。

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如何推进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实质是一定思想政治观念的个性化生产,结合前文的特殊性分析与生产发展的实践需要,亦可将其具体把握为3个层面的生产:一是以意识形态的认同构建为实践主线的“转化式生产”;二是以思想观念的个体塑造为核心内容的“个性化生产”;三是人的精神交互为现实形式的“互动式生产”。因此,推进作为一种精神生产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实现方式与实践路径就全部蕴藏于这三重“生产”的现实布展之中。

第一,在转化式生产中注重创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思想政治观念生产为意识形态集聚认同力量,而思想

政治观念生产又是以意识形态的转化与传播为前提。当我们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作一种生产的时候,已然确认了“创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禀赋。但有些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无非就是做着现存精神的传递工作,教育者只是既定思想的“传声筒”与“搬运工”,并不存在创造与创新。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精神的传递不是精神的平移、思想的交互也不是思想的复制,创新并不囿于一种定式,“转换”“拓展”“传播”都有潜在的创新意蕴。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创新是否可能,而在于创新如何彰显。

要创造地推动主导意识形态的延续与再生。思想政治教育转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内容与传播方式,促成社会成员的普遍接受,使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导地位得到确立、巩固与延续,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方式,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过程。充分发挥这一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对现实基础与实践要求进行有效把握,在实际工作中开拓新思路、运用新思维,提升工作的适应性、有效性与实用性。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条件变化,主导意识形态必须更新完善自身体系,这由专门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专家来推进,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其在承担教育职责的同时也担负研究和创新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体系、增强意识形态的现实解释力和影响力的任务^[4]。为使这项工作有效推进,就要为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事业的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通过改进评价方式、激励制度、发展机制等,充分调动有关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则要自觉运用自身才智创造地处理头脑中思想的新旧交替、吸收与外放等问题,让积累的教育经验、掌握群众的有效方式作为一种长久的精神成果被继承至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生产系统。

要创新地阐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先进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科学性与先进性。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转化,就是要将科学性、先进性直观地呈送于对象认识之中,只有人民群众真切地体认这种科学性与先进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真正地掌握人

民群众,才能不断发挥其在中国社会的强大凝聚力与引领力。这里的创新转化,并非要重塑和改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内核,更多是基于一种“范式拓展式创新”^[5],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与呈现方式进行合理创变。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宏观抽象的思想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具体形象、直击人心的教育教学话语,要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设计内容、创新形式,要深入人民日常生活于细微处引导,做到以势醒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创新的意义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把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结合起来,在比较中批判、扬弃其他意识形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生命力。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转化使其科学性、先进性得以广泛传播,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得到有效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属于一种精神领域的扩大再生产。

第二,在个性化生产中把握需求,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精神供给质量。思想观念内蕴人的需求向度,对人的思想政治观念进行个性化生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切实观照人的现实精神需求,在分析需求中有效推进供给,在发展需求中指引人生追求,不断提高人的精神生活水平与质量。

要把握人的精神需求现状,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供给。精神生产中的需求与供给是辩证依存的互生关系,精神供给质量关系精神生活质量,而有效精神供给的前提是对人的精神需求进行精确研判。思想政治教育把握人的精神需求并不涉及人的精神生活的全部方面,而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精神生产所能满足的特殊领域,主要是应对关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种种问题,如价值迷茫、道德困惑、认同危机等。思想政治教育把握人的精神需求也应对需求本身进行区分,合理的、健康的精神需求要积极响应满足;盲目的、超越自身条件和现实条件的精神需求则应及时沟通协商;消极的、有害的精神需求则要果断纠正规制。思想政治教育研判与把握人的精神需求现状,要求其对象展开深入调查研究。在当前时代条件下,可以借助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对对象精神生活状况进行精准描画,呈现出鲜活、多维、

立体的群体精神画像,更要善用现代传播手段精准投送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容,及时、准确、有效地回应个体相关精神需求。

要提升人的精神需求层次,引领高尚精神追求。相对于唯一的现实世界而言,人所拥有的可能世界是多样而丰富的,“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可以打破现实世界的种种规定和限制,在他的面前展现出来的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使得人从它的直接的、现实的物质存在中解放出来”^{[13]30}。根源于物质生活的人的精神生活,并不屈从于现实世界的束缚,人的精神的相对独立性为人的发展嵌入了某种超越性特质。作为精神生产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于人的精神生活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人们当下的既定需求,还在于超越这种需求所限定的精神追求,这一超越的意义经由人的理想信念建构而实现,它实实在在地包含在每一独立个体思想政治观念的生成之中。理想信念反映人的发展的应然向度,一个时代的人的生存意义,应当寓于实现理想的自主自觉的努力之中。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人、教育人、塑造人,正是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现实建构问题,它能提升人们的精神需求层次,使其为追求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实现个人发展而不懈奋斗。

第三,在互动式生产中加强引领,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精神交往条件。“互动式生产”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精神生产的基本形态,它以主体间的精神交往为实现方式。良性互动建立在一定精神交往条件基础上,内部条件直指交往主体的关系优化,外部条件则在于交往环境的精神建设,二者的实现要坚持一定原则与价值的引领。

要坚持交往原则引领,优化教育双方的互动方式。为了找回教育对象曾一度消弭在其“客体”身份中的主体性,现实中我们可能会偏重强调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这就难免导致对教育者主导性的某种忽略。然而,主导性的存在,不仅指认了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身份,也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具有意识形态导向性的精神生产进行了确证。一般情况下,教育者的学识修养要优于教育对象,对交往及其内容的把握也更为准确,教育者主导交往过程并不会湮没教育对象的自主性与自

觉性,反而有利于交往积极持续地进行,使主体性得到充分张扬。坚持教育者主导性与教育对象主体性的统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互动的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一原则的引领下,主体间的交往才有深入发展的可能。理解该原则,就应注意到,所谓主导性与主体性,从来不是针对教育者或教育对象单方面言说的,坚持教育者的主导性,其目的是真正激活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发挥教育者主体性,也唯有在教育者的主导下才成为可能。当然,推进主体间的精神交往,重点不只在于主体与主体之间地位与关系的探讨,还在于依据现实的生活条件,丰富主体间新的精神交往方式。网络时代赋予人精神交往多重可能,思想政治教育应抓住契机,基于新的生存实践时空,积极探索新的互动方式,如“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方式”“学习与生活相统一的互动方式”“即时与延时相交错的互动方式”^[16]等,实现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双向深度互动,延展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精神生产的时空界域。

要加强主流价值引领,创设向上向善的精神交往环境。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交往互动不是在真空环境下进行的,而是在有着一定价值取向与舆论氛围的特定空间中发生的。宏观上,引导社会价值取向与舆论发展,就要妥善处理好关涉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就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践行与培育,就要充分发挥国家强制力量对净化社会精神的推动作用。而在实际的思想教育活动中,交往通常在一定范围的“小环境”中进行,其精神文化氛围可以通过场景构筑、情绪烘托、行为引导等方式来具体营造。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空间向数字网络的深度延伸,加强网络治理也成为精神交往环境建设的题中之义。从根本上说,必须坚持党对网络综合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17]44}。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和途径,网络治理实践要激活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的引领力、传播力、融合力与整合力,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精神生产对网民生活的精神供给与价值导引,不断凝聚网络共识、发动群众参与、化解网络矛盾,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建设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结语

探讨作为精神生产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是基于一种视角,一种社会生产的宏观视角来分析这一普遍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分析要求我们将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其存在形态的衍变及其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多重互动,也要求我们关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的现实的精神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引发的精神创造。这种分析本身及其所意拓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视界,正是研究作为精神生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所在。《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5]。正因如此,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与历史上任一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根本不同,它播化意识形态,却不是为了掩饰和遮蔽现实的剥削的生产关系,也不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统治而构建愚弄民众的精神内容,而是让人们形成真正反映社会现实的思想观念,帮助人民群众摆脱虚假精神的奴役,并为寻求自身解放、实现全面发展而斗争。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背景下,考察精神生产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更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实际,尤其是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与培养时代新人的教育实际,从生产的视角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

参考文献:

- [1] 沈壮海,主编.新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10] 项久雨.利益·情感·精神:个体第一需要与德育认同的三重逻辑[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3] 鲁洁.当代德育基本理论探讨[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 [14] 董雅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边界[J].思想理论教育,2019,(9).
- [15] 陈鹏.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需要—生产理论”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共同体[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10).
- [16] 徐曼,黄祎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互动的展开、张力及优化[M].思想教育研究,2022,(11).
- [1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责任编辑 李基礼]